

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影响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实证研究

刘 斌 志 邓 国 文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数字媒介深刻塑造青年的认知结构与心理状态,短视频的高度渗透引发其发展信心的系统性耗散。如何理解并有效干预短视频对青年信心的影响,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回应的重要命题。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研究将青年信心视为处于开放、非线性、远离平衡态与涨落的系统,并运用 CFPS 2014—2022 数据和双重差分法分析短视频对青年发展信心的冲击。实证发现,短视频使用显著削弱青年发展信心,且该效应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群体中均表现出较高一致性。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短视频通过两条路径间接作用于信心:其一,短视频通过算法强化社会比较效应,削弱青年对自身阶层身份的认同,动摇其社会地位认知基础,进而降低发展信心;其二,短视频的“信息茧房”减少青年对社会风险的感知,使其陷入主观伪平衡态,削弱其现实问题应对动能,间接冲击信心系统。鉴于此,研究提出优化信息开放性、构建正向熵输入机制、促进动态非平衡,提升青年媒介素养,利用涨落效应激励青年信心跃迁、强化非线性调控,建立多层级联动干预体系四个方面的建议。研究在理论上拓展了短视频影响青年信心的非线性动力学路径,在方法上突破了线性因果框架,揭示了阶层认同与风险感知的双重中介路径,在实践中为青年信心提升提供了熵流调控干预逻辑和经验支持。

关键词:数字时代;短视频使用;青年;发展信心;耗散结构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4-0056-13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406

一、数字时代青年信心的耗散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1]身处机遇与压力并存、变革与不确定交织的时代,民族复兴为青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内卷加剧与价值碰撞也使他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在短视频等新型媒介的广泛渗透下,一种算法驱动的信息消费方式正在重塑青年的注意力结构、价值评判机制与自我建构逻辑。短视频并非青年发展困境的唯一成因,却是影响其发展状态的重要变量。不同于传统媒介,短视频以其快速、碎片化、娱乐性的形式争夺青年注意力,并通过算法推荐机制强化情绪共鸣与信息同质性,形成一种去目的化的沉浸环境,导致青年决策疲劳、自我认同分裂与发展信心降低。青年内在发展能量的单向流失表明青年信心正在“耗散”,如何在短视频

收稿日期:2025-04-08

作者简介:刘斌志,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空间理论视域下青少年虚拟社交风险的生成机理与网络社会工作介入研究”(23XSH005)。

浪潮中找到自我坐标,平衡个人理想与现实困境,成为摆在青年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中文日常语境中,“耗散”一词常被泛化为“消耗、流失”等语义,但在系统科学中,“耗散(Dissipation)”一词是由伊里亚·普里戈金于1969年提出的,意为“开放系统通过耗散能量维持动态有序的结构”。这一概念来源于“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界条件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可能从原有的混沌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形成新的有序结构^{[2]1-11}。前者的耗散强调系统正在单向衰亡、走向衰退,后者的耗散更强调系统能通过耗散旧能量创造新秩序、走向转型。

青年信心系统处于开放的信息环境中,特别是在短视频所引发的强扰动场景下,其信心秩序可能会发生动摇乃至解构,但在适当的外部条件与自组织机制作用下亦可实现重构与转向,因此,本研究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并基于CFPS 2014—2022(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评估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影响。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理论上拓展了耗散结构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边界;第二,机制上突破了传统线性因果分析框架,揭示了阶层认同与风险感知的双重中介路径;第三,实践上为优化算法推荐机制、设计青年心理韧性和信心提升方案提供了实证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何为信心:概念诠释与影响机制

本研究讨论的信心是个体发展信心,指能够使个体相信某一事物(目标)未来可以实现的一种心理力量^[3],表现为个体对未来生活成功的信念。目前对影响信心的因素的讨论主要从个体与结构两个视角展开。基于个体视角,年龄越大^[4]、受教育水平越高、个体收入越高^[5]、社会公平感强、相对剥夺体验弱的人^[6]往往信心更强,性别^[4]、性格、自尊^[7]、洞察力^[8]与耐受力^[9]等个体特质、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10]也会对信心产生影响。基于结构视角,家庭环境对个体信心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10],互联网的使用方式^[11]、文化差异^[12]、政府行为、政治稳定^[13]和经济政策^[14]对信心也有影响。

短视频对信心的影响可能会呈现出独特的“双刃剑”效应。知识类、职场类与技能类等功能性内容能够帮助青年获取资源,成为青年学习轻知识和新技能的工具。平台提供寓教于乐的内容能满足青年的娱乐需求^[15],提升其自我效能感^[16]¹³⁵,进而增强发展的可控性与信心。然而,短视频多巴胺驱动型的满足机制也可能导致目标延迟、满足能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使青年更倾向于放弃长期目标,转向短期满足,从而动摇信心的认知基础^[17]⁹³。短视频使用对青年发展信心的影响并非单一方向,而是取决于使用内容、使用动机、心理加工能力等多重变量的交互结果,因此,本研究提出一组竞争性假设:

H1a:短视频的使用,可能会提升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H1b:短视频的使用,可能会降低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二)信心何以被解构和重塑:短视频使用与信心耗散的机制

耗散结构的形成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开放系统,指与外界环境存在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孤立系统会趋于热力学平衡,熵增最大,导致内部系统无序;开放系统才能汲取负熵来抵消内部熵增,实现动态有序。二是远离平衡态,即系统受到强烈的驱动,迫使其远离平衡,自发形成新型结构和组织。三是非线性动力学过程,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其本质是打破简单的因果关系,强调输入微小的变化可能导致输出的巨大波动。四是涨落,即系统在临界点附近利用非线性机制,微小的随机扰动可能被放大为巨涨落,最终触发系统从旧稳态向新稳态的突变^[18]⁷¹⁻⁷²。根据耗散结构的形

成要素,可以判定青年信心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因人而异,呈现不同的信心状态(见图1)。

图 1 耗散结构下青年信心的机制模型

无论是身份认同的重塑还是风险社会再变迁,都是短视频浪潮下社会整体变迁的缩影。短视频使用究竟如何引起青年发展信心的变化?本研究主要总结了两种可能的机制。

现代性条件下的个体化过程意味着个体必须成为自己生活规划和行为的中心^{[19]79}, 现代人需要对自身的生活和行为负责, 成为自身发展的主体。创作、传播和消费社交媒体成为以下行为的重要途径: 个体价值现代言^[20], 表达和塑造形象^[21], 探索、确认和巩固社会、文化和经济身份。然而, 这一认同并非单一线性过程。其一, 短视频既可能强化现有阶层身份, 也可能让个体产生向上或向下的流动焦虑。一些底层用户可能通过短视频展现奋斗过程, 试图获得更高的阶层认同, 而另一部分用户可能通过观看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加深阶层焦虑。用户在缺场空间中进行多重身份实践的重组, 颠覆对原先阶层地位的感知。其二, 短视频的快速传播可能导致一些低质量甚至是有害的内容扩散, 通过特定的媒介话语解构身份、剥离阶层归属, 出现阶层区隔与消解^[22], 对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23]。

H2:短视频的使用通过削弱青年个体的阶层认同,间接削弱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是“人为不确定性”^{[25]7},而数字媒介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加剧了

这种不确定性^[26],扭转和增强了传统社会风险感知。其一,传统的社会风险感知源于权威系统对风险话语的垄断权,而短视频通过分布式信息生产传播机制解构了这一权利,使风险场景实时可见,以直观的视觉形象、紧张的听觉效果与夸张的标题等形式强化了风险感知度^[27],引发焦虑、无助与逃避心理^[28]。其二,短视频加剧认知偏差,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的个性化和娱乐化^[29]会根据用户偏好进行内容推送,导致“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效应^[30],使用户对某一领域风险过度敏感,成为风险传递的桥梁^[31],进而形成社会充满风险、不可控的总体印象。其三,短视频中的危机可视化、焦虑情绪传染以及负面曝光机制,进一步放大了对社会的不确定性感知,使用户对经济压力、阶层固化与就业竞争等问题产生持续性担忧,这种“后真相”^[32]的情绪性媒介内容越密集,个体对社会风险认知就越高,进而产生虚拟社会焦虑^[33]。短视频的高频使用会在信息层面形成一种风险过剩的心理感知,使青年在主观上倾向于对未来社会环境形成悲观预期。

当外部环境被认知为威胁性强、资源可获取性低时,个体便更易陷入认知封闭与动机抑制状态^[34],进而削弱信心。短视频使用所引发的社会风险感知,为短视频与信心之间建立了情绪性与认知性桥梁。青年在持续接触负面或危机类短视频内容后,其对社会环境的风险判断被持续放大,形成对发展前景的不信任与不确定性感知。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3:短视频的使用会增强青年个体的社会风险感知,间接降低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和估计策略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原始数据是由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2的五期数据所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该调查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发起并实施的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大型微观社会跟踪调查项目,其样本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每期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结合研究主题,本研究最终将青年群体的年龄范围限制在18~35周岁。经过截面数据汇总,五期数据总计样本量为48486,但由于样本中部分变量存在缺失,本研究在基准估计中对缺失值采取了整例删除处理,因此,最终进入主要估计模型的样本量为27252。

(二)变量、测量与估计策略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在CFPS问卷中,每期均对信心进行了测量,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您给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打几分?”本研究将其作为个体发展信心的代理变量。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是短视频的使用,旨在探究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变迁过程中短视频使用的冲击效应。在CFPS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过去一周,您是否看过短视频或直播类网络平台节目(包括观看小火山、抖音、快手、微视与斗鱼等)?”由此,本研究将是否使用短视频软件视为一种个体处理冲击,并使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简称DID)对短视频使用的动态效应进行检验。

在本研究中,使用网络是使用短视频的前提,因此,将是否使用网络作为第一重虚拟处理变量(condition)。同时,将是否使用短视频作为第二重虚拟处理变量(use)。最后,本研究将可能的影响机制变量同步纳入模型,最终构建起以下模型,藉以探究短视频使用何以冲击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并尝试做进一步的机制分析。

$$y_i = \beta_0 + \beta_1 \times \text{condition} \times \text{use} + \beta_2 \times x_i + \delta \times \text{Control}_i + \gamma_p + \varepsilon_{it}$$

其中,被解释变量 y_i 表示青年个体发展信心。核心的解释变量是 $condition \times use$ 。其中, $condition$ 表示是否使用网络的第一重虚拟处理变量,个体使用网络, $condition = 1$; 个体不使用网络, $condition = 0$ 。 use 表示是否使用短视频的第二重虚拟处理变量。个体使用短视频, $use = 1$; 个体不使用短视频, $use = 0$ 。 x_i 为个体特征变量。 $Control_{it}$ 是控制变量。 i 和 t 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γ_p 表示省一级区域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误差项。考虑到部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本研究对 DID 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均在 2.0 以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研究,本文将以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1)性别(女性=0,男性=1),(2)年龄,(3)城乡类别(乡村=0,城市=1),(4)受教育年限,(5)政治面貌(非共产党员=0,共产党员=1),(6)户口类别(农业户口=0,非农业户口=1),(7)婚姻状态(单身=0,非单身=1),(8)个体年收入(+1 的自然对数)。

4. 机制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机制变量是自评社会地位和社会风险感知。在 CFPS 问卷中,每期均对自评社会地位和社会风险感知进行了测量,对应的题目分别为“您给自己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打几分?”“您认为以下问题在我国的严重程度如何?”其中,0~10 表示被调查者的态度(包含政府廉政、环境保护、贫富差距、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八个方面),0 代表这方面的问题在我国不严重,10 代表非常严重,问卷要求被调查者在 0~10 之间选择一个数字。对自评社会地位,我们采用了其原始得分;对社会风险感知,我们采取主成分提取降维的方式,提取出了一个特征值为 4.215 35 的主成分(KMO 值为 0.892, Bartlett's 球形检验 $p < 0.05$,其他成分的特征值均小于 1),将其作为社会风险感知的代理变量。各主要变量及控制变量的定义与描述统计见表 1 及表 2。

表 1 主要变量的设定、含义与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含义
被解释变量	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y_i	个体对于未来的信心程度
核心解释变量	使用网络× 低强度使用短视频	$condition \times use_{low\ intensity}$	是否使用网络× 是否使用短视频(低强度)
	使用网络× 高强度使用短视频	$condition \times use_{high\ intensity}$	是否使用网络× 是否使用短视频(高强度)
	性别	$Gender$	个体的性别
	年龄	Age	个体的年龄
控制变量	城乡类别	$Urban$	个体所生活的城乡类别
	政治面貌	$Party$	个体的政治面貌
	受教育年限	$Years\ of\ education$	个体的受教育年限
	户口类别	$Hukou$	个体的户口类别
	婚姻状态	$Marriage$	个体的婚姻状态
机制变量	年收入	$Income$	个体的年收入
	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Ln(Income+1)$	个体的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自评社会地位	$Self-assessment\ of\ social\ status$	个体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价
	社会风险感知	$Social\ risk\ perception$	个体对于整体社会风险的感知

注:(1)年收入的自然对数计算方式是(金额+1)的自然对数;(2)年收入的单位为人民币元;(3)在 CFPS 问卷中,短视频使用高低强度的区分条件是:“您是否几乎每天都看短视频或直播类网络平台节目?”

表 2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被解释变量	青年个体发展信心	4.133	0.860	1	5	41 082
核心解释变量	使用网络× 低强度使用短视频	0.240	0.427	0	1	48 486
	使用网络× 高强度使用短视频	0.180	0.384	0	1	48 486
	性别(男性=1)	0.500	0.500	0	1	48 483
	年龄	27.103	4.953	18	35	48 486
控制变量	城乡类别(城镇=1)	0.528	0.499	0	1	43 791
	政治面貌(共产党员=1)	11.286	3.810	0	1	43 826
	受教育年限	0.058	0.233	0	24	48 486
	户口类别(非农户口=1)	0.189	0.391	0	1	44 181
	婚姻状态(非单身=1)	0.589	0.492	0	1	45 622
	年收入	20 222.10	60 753.06	0	10 300 000	48 486
机制变量	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4.473	5.171	0	16.147 65	48 486
	自评社会地位	2.715	0.941	1	5	41 015
	社会风险感知	0.000	2.053	-8.384	3.725	36 246

四、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实证分析

(一) 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

表 3 展示了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考虑到短视频使用频率和青年是否参加工作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影响上可能存在异质性,本研究分别构建了五个模型: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为仅加入控制变量的初步回归模型和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短视频冲击的全样本模型(其中模型 2 为低强度使用),模型 4 和模型 5 是以是否参加工作为标准的分组回归模型。

表 3 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个体发展信心	个体发展信心 (低强度使用)	个体发展信心 (高强度使用)	参加工作样本	接受教育样本
使用网络× 使用短视频		-0.058*** (0.017)	-0.049*** (0.017)	-0.057*** (0.017)	-0.151*** (0.024)
工作满意度				0.069*** (0.006)	
自评收入水平	0.028*** (0.006)	0.030*** (0.006)	0.030*** (0.006)	0.022*** (0.006)	
自评社会地位	0.082*** (0.006)	0.080*** (0.006)	0.081*** (0.006)	0.079*** (0.006)	

续表3

变量	(1)	(2)	(3)	(4)	(5)
	个体发展信心	个体发展信心 (低强度使用)	个体发展信心 (高强度使用)	参加工作样本	接受教育样本
社会风险感知	0.026 *** (0.003)	0.025 *** (0.003)	0.025 *** (0.003)	0.024 *** (0.003)	0.041 *** (0.0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620 *** (0.087)	2.608 *** (0.086)	2.613 *** (0.086)	2.532 *** (0.086)	2.371 *** (0.165)
样本量	27 252	27 252	27 252	23 854	4 448
调整后 R^2	0.220 8	0.221 5	0.221 2	0.222 7	0.206 6

注:(1)考虑到短视频使用的地域异质性所导致的组内自相关,可能会造成结果估计存在偏误,本研究使用了省份聚类的标准误,括号内为省份聚类标准误,后文均是如此,不赘述;(2) * $P<0.10$, ** $P<0.05$, *** $P<0.01$; (3) 由于篇幅原因,控制变量、社会信任倾向、奉献精神倾向、生活满意度与政府工作评价的估计结果不在此展示,后文均是如此,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获取整体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3的结果显示,在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前,自评收入水平、自评社会地位、社会风险感知均显著影响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后,短视频使用冲击显著降低了青年个体发展信心($b=-0.058, P<0.01$)。而对于是否参加工作,在分组回归中,无论参加工作($b=-0.057, P<0.01$)还是正在接受教育($b=-0.151, P<0.01$),短视频使用冲击效应均相对显著,且通过似不相关回归联合估计检验,发现是否参加工作的短视频使用冲击效应存在显著差异($\chi^2=11.57, P<0.001$)。这表明,短视频使用确实降低了青年个体发展信心,且这种冲击效应在正在接受教育的群体中显著增强。由此,假设H1b得到了支持,假设H1a未能够通过。

(二)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最基本的假设是平行趋势假设(Parallel Trend Assumption),是指倘若处理组个体未接受干预或冲击,则其结果变动趋势与控制组个体结果变动趋势相同^[35]。本研究通过事件研究法对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动态冲击效应进行了检验,考虑到信心变迁可能存在的事前趋势,本研究参考Beck^[36]、刘胜^[37]等人的做法,先计算出事前的回归系数均值,然后对所有期数的回归系数和置信区间采取去均值的方式,以尽可能地控制这种趋势,检验结果见图2。在短视频浪潮席卷之前,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冲击动态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0;短视频开始流行之后,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冲击动态效应出现了显著下降。由此,本研究所使用的代理变量符合平行趋势检验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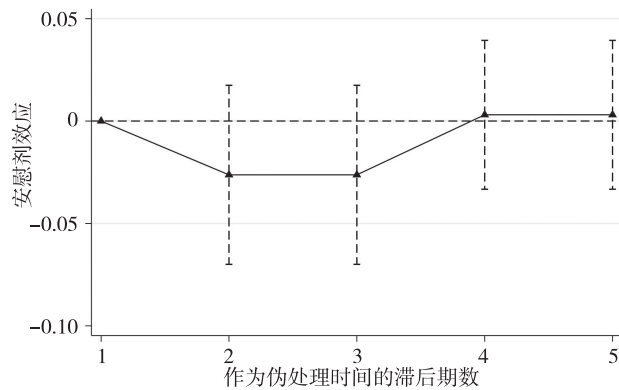


图2 平行趋势检验: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动态冲击效应

(三) 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短视频的流行实际上是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行,在空间上很难划分出明确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因此,为进一步确认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冲击效应,本研究通过对短视频流行时间(2018年)进行随机虚构,每次随机抽取500个个体,并重复进行1000次随机回归,以此作为短视频冲击的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检验结果见图3。结果显示,绝大部分虚构年份的回归结果的置信区间均包含了0,说明短视频使用对青年发展信心的影响不是由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遗漏变量)所造成,这进一步检验了短视频使用对青年发展信心的冲击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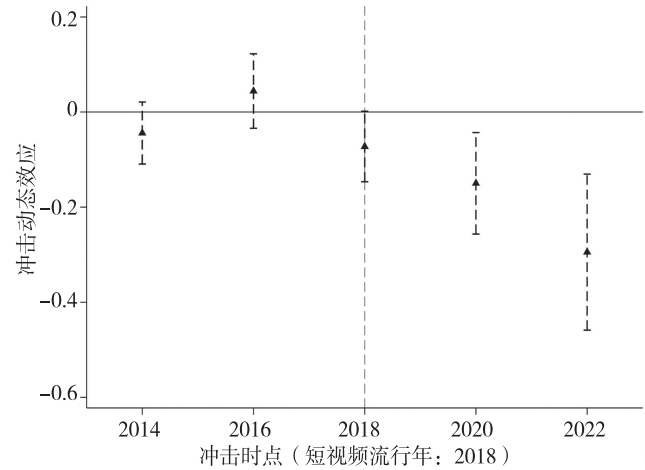


图3 安慰剂检验:随机生成伪处理时间(重复1000次,每次抽取500个个体)

(四) 因果机制识别与检验

上文中,本研究已经检验了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冲击效应,但短视频使用究竟是如何冲击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需要做进一步的机制识别与检验。在前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已经提出了两种可能的影响机制。为检验这两种机制,本研究参考了曾永明等人的做法^[38],通过两步法直接对变量间的中介效应进行识别,第一步即双重差分估计中的基准回归,第二步则构建如下公式:

$$Z_i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condition \times use + \alpha_2 \times x_i + \delta \times Control_{it} + \gamma_p + \varepsilon_{it}$$

其中, Z_i 是中介变量,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影响机制。表4是机制分析检验的结果。

表4 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1)	(2)
	阶层身份认同机制	社会风险感知机制
使用网络×使用短视频	-0.060*** (0.015)	-0.579*** (0.0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642*** (0.078)	-1.489*** (0.088)
样本量	36 022	31 704
调整后 R^2	0.008 9	0.035 4

注:(1)括号内为省份聚类标准误;(2) * $P<0.10$, ** $P<0.05$, *** $P<0.01$;(3)考虑到短视频的流行已经近乎普遍,用低强度的短视频使用做机制分析可能会由于区分样本过少产生估计偏误,因此,此处的短视频使用是指高强度的短视频使用,后文中的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亦是同理,不赘述。

1. 阶层身份认同

研究发现,在所有基准回归中,自评社会地位越高,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往往也更高,而短视频的使用使自评社会地位($b = -0.060, P < 0.01$)显著降低。这说明在短视频浪潮兴起后,其潜在的社会传播能力实际上成为社会差距的“放大镜”,加剧了社会比较的算法强化效应,颠覆了青年传统的社会认知,进而改变了其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由此,假设 H2 得到了支持。

2. 社会风险感知

同身份认同一致,在基准回归中,社会风险感知越高的青年往往个体发展信心越高,而短视频的使用则使社会风险感知($b = -0.579, P < 0.01$)显著降低。这说明高强度短视频的使用会使青年沉浸在短视频软件所编织的“信息茧房”中,短视频所带来的多巴胺享受使其对社会风险的感知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由此,假设 H3 未能够通过。假设未通过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与西方工业社会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而中国素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与享乐主义不同,往往危机意识越强的青年群体会具有更高的发展信心。

(五) 异质性分析

1. 短视频使用冲击的群体异质性

考虑到短视频使用冲击可能在不同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群体间存在异质性,为了更全面地评估冲击效应,基于上文中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研究从性别、城乡类别、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四个维度对冲击效应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何种群体区分方式,短视频的使用都会使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出现显著下降,且通过似不相关回归联合估计检验,短视频的冲击效应在研究预想的四种群体中并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结论。

2. 青年短视频使用和个体发展信心的群体异质性

考虑到短视频使用和个体发展信心本身也会在不同的群体中存在异质性,因此,研究也通过 t 检验的方式,对两者的群体异质性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男性、未接受高等教育、中高收入群体往往更热衷于使用短视频,而城乡之间不存在短视频使用上的显著差异;男性、生活在农村、未接受高等教育群体往往个体发展信心更高,而低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个体发展信心上却并不具有显著差异。

(六) 稳健性检验

为使估计结果更加稳健,本研究也考虑了短视频使用作为核心变量的潜在内生性问题。尽管我们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部分极有可能影响信心的人口学特征变量,但回归模型扰动项中某些不可观测的变量,比如青年观看的短视频类别与内容,可能会同时影响青年信心,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为更好地处理内生性问题,使本研究的结论更加稳健,本研究使用各省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作为短视频使用的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加以校验。由于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实际上是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直接表现,并不与青年信心直接产生关联,但是与短视频使用存在较强相关性($r = 0.454, P < 0.000$),这也意味着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会是很好的工具变量。表 5 是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简称 2SLS)估计结果。

表 5 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冲击的 2SLS 估计结果

变量	OLS	2SL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使用网络×使用短视频	-0.049*** (0.017)		-0.253*** (0.027)

续表5

变量	OLS	2SL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0.000*** (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613*** (0.086)	-0.088*** (0.018)	2.584*** (0.048)
样本量		27 252	
R^2	0.221 7	0.256 3	0.214 4
$Wald\ chi^2(k=15)$	—	—	5 292.79
$Prob > \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弱工具变量检验 F 统计量	—	2 663.12***	
Hausman 内生性检验估计量	—	72.016 3***	

注:(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2) * $P<0.10$, ** $P<0.05$, *** $P<0.01$;(3)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数据来源系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单位为万GB。

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2SLS)来看,OLS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低估了短视频使用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冲击影响,而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数据无论是在弱工具变量检验中还是在内生性检验中,均表现出色,说明其是一个强工具变量。由此,研究也进一步确认了短视频使用的确会使青年个体发展信心显著下降。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对短视频使用何以冲击青年个体发展信心展开系统性检验,尝试为解读短视频浪潮中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总体而言,短视频使用显著削弱青年个体发展信心,且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群体中该效应均表现出较高一致性,未呈现显著的群体间异质性。本研究总结了短视频使用冲击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理论机制(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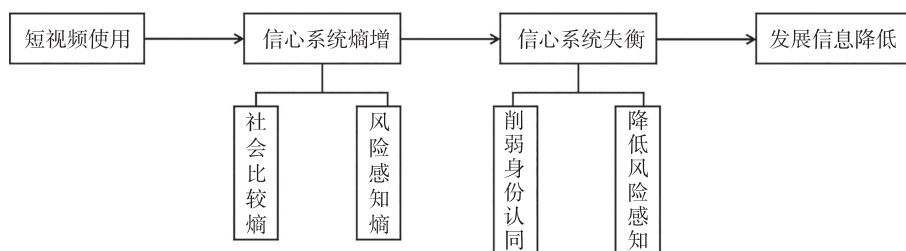


图4 短视频使用冲击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理论机制

从身份认同机制来看,其一,短视频平台的信息生态在算法机制作用下强化了特定内容的可见性与接触频率,削弱了青年的原有阶层认同,动摇了其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其二,短视频加剧了青年社会地位感的不平衡,如高收入成功人士等形象所引发的阶层仰望心理,或务工生活记录等内容所带来的现实焦虑,再如社会底层个体成功逆袭类叙事虽在短期内激发积极情绪,但长期可能诱发心理落差与相对被剥夺感,进而产生自我贬低倾向;其三,青年在不同类型内容的持续接触中,可能在信心增强与焦虑加深之间经历了显著的心理波动,当信息输入强度超过心理耐受阈值时,个体的阶层认同可能出现断裂性

变化,进而整体下调自评社会地位,影响发展信心;其四,短视频对发展信心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青年社会地位认知随内容输入动态变化,当冲击累积超过临界点时,可能导致发展信心系统整体崩塌。

从风险感知机制来看,其一,短视频可能带来信心系统的信息封闭风险,使青年沉浸于娱乐化、碎片化的信息,减少风险感知的输入,导致发展信心系统停滞;其二,社会风险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引导个体发展信心重构的功能,但短视频内容的娱乐性满足特征易使青年滞留于一种主观感知上的伪平衡态,削弱其对现实问题的应对动能;其三,短视频的即时满足机制可能延缓青年在面临高度社会不确定性感知时的应激性转化与适应性成长,使其发展信心系统的自组织力下降,无法完成应有的提升;其四,短视频使用与社会风险感知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多样化路径。若社会风险感知水平较高而短视频使用频率低,青年可能积极调整,实现跃迁;若短视频使用频率较高而社会风险感知水平较低,更易呈现出消极适应倾向,导致发展信心停滞;两者共同作用时,部分青年虽有焦虑,但因短视频的安慰效应,适应性调整减缓。

为了避免短视频使用进一步扩大对青年个体发展信心的影响,本研究结合耗散结构理论,提出四条建议。第一,优化信息开放性,构建正向熵输入机制。在平台方面,规定正向内容推荐比例^[39],优先推送涵盖教育发展、职业技能获取及心理韧性提升等内容的短视频资源。在政策层面,可以设立青年成长短视频引导基金,面向教育机构、内容创作者征集优质成长型短视频。第二,促进动态非平衡,提升青年媒介素养。设立短视频媒介素养提升项目,内容包括风险识别、算法理解与心理抗压训练等。第三,利用涨落效应,激励青年信心跃迁。平台和社会工作者可设置成长挑战赛^[40],通过激励机制鼓励青年记录与展示其技能提升、职业探索与公益参与等积极发展轨迹,弥合数字身份与现实身份之间的间隙^[41];也可内嵌情绪健康提醒板块,在使用时长超过特定阈值或负面信息暴露密度较高的情况下,系统自动推送心理调节内容与自我调适指导建议。第四,强化非线性调控,建立多层次联动干预体系。政府可加强短视频平台内容审核和严控炒作焦虑与煽动负面情绪类内容;社会组织、心理咨询机构进驻短视频平台提供心理援助与职业咨询服务;家庭建立代际沟通机制,倡导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学校将发展性心理辅导纳入必修课程体系,系统提升青年心理弹性与现实适应能力等。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尚待完善之处。首先,短视频的实际流行时间可能更早于2020年。根据现有的相关资料以及研究者所了解的短视频的发展历程,本研究更倾向于认为短视频实际的流行时间是2018年左右,但囿于CFPS首次就短视频使用情况进行数据收集的时间始于2020年,前期数据尚未覆盖该变量,因此,实际上缺失了2018年、2019年样本短视频使用的情况。其次,研究无法关注到每个样本个体究竟是如何使用短视频的,具体到青年的观看内容倾向、是否存在长时间的依赖抑或短时间的戒断等。这些关键信息的缺失也可能会导致因遗漏变量而出现内生性问题,进而使本研究的估计存在偏误。由此,本研究亦尝试从方法论维度提出进一步的反思与探讨。在上述问题中,前者或可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式,根据2020—2022年使用短视频与不使用短视频的个体特征,对2018年、2019年的样本进行缺失值的预测,并做进一步的差分估计,与目前的结果进行对比,而后者则可通过调查实验法的设计,在问卷系统中通过随机生成情景,以更有效地避免社会合意性偏差与个体信息披露风险,进而补齐更多可能的遗漏信息。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 湛垦华,沈小峰,等.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 [3] 魏钦恭,刘伟.灾害冲击、社区韧性与城乡居民发展信心——基于云南民族地区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20(4):70-89.

- [4] Lundeberg M A, Fox P W, Punecohar J. Highly confident but wrong: Gende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confidence judgment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4(1):114-121.
- [5] 雷开春. 青年人的阶层地位信心及其影响因素[J]. 青年研究, 2015(4):1-9+94.
- [6] 刘程. 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 青年研究, 2016(2):11-20+94.
- [7] Murray S L, Holmes J G, Macdonald G, et al.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darkly? When self-doubts turn into relationship insecuriti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8(6):1459-1480.
- [8] 杜刚, 吕厚超, 李小保. 过去时间洞察力与社会信心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127-134+203.
- [9] 董祥宾. 信念的发生基础和形成过程[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4):58-64.
- [10] 孙一兰. 留守经历对大学生自信人格的影响与朋辈心理辅导[J]. 教育与职业, 2016(13):79-82.
- [11] 杜世超. 互联网使用类型与青年群体的未来阶层预期[J]. 青年研究, 2024(2):14-26+94.
- [12] Lundeberg M A, Fox P W, Brown A C, et al. Cultural Influences on Confidence: Country and Gender[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0(1):152-159.
- [13] 蔡卫星, 高明华. 政府支持、制度环境与企业家信心[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118-126.
- [14] 万光彩, 范学成. 企业家信心、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时变效应[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0(6):16-27.
- [15] 孙宏艳. 视频时代如何引导学生运用网络学习——未成年人短视频使用与学习轻知识研究报告[J]. 人民教育, 2023(22):48-53.
- [16]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M].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97.
- [17] Bauman Z. Consuming Lif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 [18] 颜泽贤. 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
- [19]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 夏璐,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20] 王冠宇. 封闭与开放: 社交媒体环境下青年群体的网络舆论引导策略探究[J]. 探索, 2018(4):179-186.
- [21] 秦静, 杜全清清. 小镇青年短视频使用对政治认同的影响[J]. 青年记者, 2023(6):65-67.
- [22] 陈云松. 观念的“割席”——当代中国互联网空间的群内区隔[J]. 社会学研究, 2022(4):117-135+228.
- [23] 韩桥生, 张文. 网络短视频与青年价值观的融合共生[J]. 当代青年研究, 2020(2):46-51.
- [24] Ellemers N, Spears R, Doosje B. Self and Social Identity[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2(1):161-186.
- [25] 贝克, 乌尔里希. 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M].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 [26] 顾亚奇. 社交媒体时代短视频的多重文化图景[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3):142-150.
- [27] 黄勇军, 段梦寒. 灾害短视频的拟像共同体传播: 内聚焦叙事、价值转向与纪念仪式[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77-87.
- [28] Ferrer R, Klein W M. Risk perceptions and health behavior[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15(5):85-89.
- [29] 杨章文. 网络泛娱乐化: 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及其“解蔽”[J]. 探索, 2020(5):181-192.
- [30] 艾楚君, 孙淑雅, 马钰莹. 短视频对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基于 10305 名青年大学生的调查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11):90-96+30.
- [31] 靖鸣. 风险感知与行为阈限: 传播风险特征、成因及防范策略[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96-104.
- [32] 庞金友. 网络时代“后真相”政治的动因、逻辑与应对[J]. 探索, 2018(3):77-84.
- [33] Ostendorf S, Mueller S M, Brand M. Neglecting Long-Term Risks: Self-Disclosure on Social Media and Its Relation to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Tendencies and Problematic Social-Networks-Us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11):2913.
- [34] Hobfoll, Stevan 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3):513-524.
- [35] 黄炜, 张子尧, 刘安然. 从双重差分法到事件研究法[J]. 产业经济评论, 2022(2):17-36.
- [36] 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Finance, 2010(5):1637-1667.
- [37] 刘胜, 温锡峰, 陈秀英. 循环经济政策与中国企业环境绩效: 助推器抑或绊脚石? [J]. 经济学报, 2023(2):175-210.

- [38] 曾永明,吴琼,蒋国河.信心的生产:扶贫扶志行动的社会效应研究[J].社会学研究,2024(4):1-22+226.
- [39] 邱萍,阎国华.逻辑与应对:短视频时代的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J].当代电视,2024(8):43-49.
- [40] 芦恒.数字社会工作的生活性基础:理论与实践的反思[J].中州学刊,2025(4):84-92.
- [41] 刘斌志,赵铭.返乡青年短视频创业中的身份呈现与主体重构[J].青少年学刊,2024(6):10-18.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 Usage on the Development Confidence of Young Individual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Liu Binzhi Deng Guowe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401331, China)

Abstract: Digital media profoundly shapes the cognitive structures and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young people, and the high penetration of short videos has triggered the systematic dissipation of their confidence in development. How to understand and effectively intervene in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s on young people's confidence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responses. Based on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this study regards young people's confidence as a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openness, nonlinearity, distance from equilibrium, and fluctuations. It uses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2014—2022 an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s on young people's confidence in development. Empirical findings show that the use of short videos significantly weakens young people's confidence in development, and this effect exhibits high consistency across group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tic analysis further reveals that short videos indirectly affect confidence through two pathways: First, short videos algorithmically strengthen the social comparison effect, weaken young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own class identity, shake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thereby reduce their confidence in development. Second, the information cocoon of short videos reduces young people's perception of social risks, trapping them in a subjective pseudo-equilibrium state, weakening their momentum to cope with real-world problems, and indirectly impacting the confidence system. Therefor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four aspects: optimizing information openness to construct a positive entropy input mechanism; promoting dynamic non-equilibrium to enhance young people's media literacy; utilizing the fluctuation effect to inspire a leap in young people's confidence; and strengthening nonlinear regulation to establish a multi-level collaborative intervention system. The study, theoretically, expands the nonlinear dynamic pathways through which short videos affect young people's confidence; methodologically, breaks through the linear causal framework and reveals the dual mediating pathways of class identity and risk perception; and practically, provides the logic of entropy flow regulation and intervention as well as empirical support for enhancing young people's confidence.

Keywords: digital age; short video usage; youth; develop confidence;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责任编辑:赖黎捷]